2000年5月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May 2000
第37卷第3期 Journal of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Social Sciences) Vol.37 No.3

唐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

盛会莲
(西北师范大学 敦煌学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摘 要】坊市制度是封建社会城市管理的基本制度。有唐一代，坊市制度的发展变化表现为前期制度上的严密化、细致化和后期实践中的滞后性和被冲击。这一发展趋势体现了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的相对游离、失衡状态，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变化。

【关键词】唐代 坊市制度 商品经济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00)03-0099-04

坊市制度是中古社会对城市生活进行组织管理的一种基本制度，主要包括坊市分区、定时启闭坊市门以及夜禁等内容。它是统治阶级试图从时间上和空间上严密控制城市社会生活的措置，是集权统治在城市管理中的具体体现。

坊市制度起源颇早，从周代产生后，历代承传不衰，并在具体制度上逐渐严密。在封建社会鼎盛时期的唐代，坊市制度在前期随着集权统治的强化而进一步严密细致；但到唐后期，随着人身依附关系减轻前提下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和繁荣[1](P250)，城市中的商业经济突出发展，坊市制度遂显落后，死板的坊市束缚频遭冲击，渐难维持。坊市制度被冲击的遭际是唐代经济史上的醒目之点，尤其是坊市分区的无法执行和夜市的出现，每每成为史家论述唐代商业繁荣的力证，为不少史论所涉及。但把这一经济、社会管理制度在有唐一代的发展及遭际作为主题加以研究，进而揭示封建社会政治经济之间的矛盾运动及其发展规律，这方面的研究尚显不足。本人不揣浅陋，想就此作些努力，不妥处切希方家教正。

一

坊市制度的渊源可以追溯得很远，从商代城中设市起，市即是城中较为固定的特殊区域。西周时，坊市制度逐渐萌芽，当时，无所不包的“王制”即有对城内建置的规划，“量地度居邑，有城郭，立朝市，地以度邑，以度民”[2](卷9)，“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3](卷12)春秋战国时代不仅是我国历史上城市的第一个大的发展期，坊市制度也在此段历史中基本形成。当时城市的规划管理情形是：“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4](卷11，P471)具体市制更详，市有“阛阓”，“阛者，市垣也；阓者，市门也。”[5](都邑第二)即市以墙垣圈围，设门供人出入；市门由专人把守，“凡市入，则胥执鞭度守门”[4](卷4)；市之开合以市官办公处房顶上的旗帜为令，即“上旌于思次以令市”[4](卷4)；入市交易必由市门出入，所以在商业经济一度活跃的战国时代，有“明旦，侧肩争门而入，日暮之后，过市朝者掉臂而不顾”[6](卷75)的情形。市内规划亦有记载：“凡建国，佐后立市，设其次，置其叙，正其肆，陈其货贿。”[4](卷2)正肆、陈货是列肆销售货物，次、叙是市吏办公的馆舍；当时管理市的官员有司市、胥吏、质人等30多人[4](卷4)。可见，市制在此时已基本具备了统治者从时间和空间上控制市内活动的精义。秦汉时期，坊制有了突出发展，当时城内的居民区划被称作闾里，即“听闾里以版图”[4](卷1)。汉代的长安城就有“闾里一百六十”[7](卷1)，且布局已比较规则齐整，“室居栉比，门巷修直”[7](卷1)，“街衢相经，廛里端直，甍宇齐平。”[8]其他郡县城市规模有差，但形制相仿。魏晋南北朝时的城坊益向规则齐整发展。曹魏邺城已由东西大街分成南北两部分，居民区集中位于城

【收稿日期】1999-03-10
【作者简介】盛会莲(1972—)，女，甘肃武威人，西北师范大学助理研究员，从事唐史研究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南，“其间闾则长寿、吉阳、永平、思忠”。[9]北部则为宫殿官署区，全城中轴分明，区划匀称，已形成棋盘式街道布局的雏形；北魏洛阳的规划布局与曹魏邺城一脉相承，坊制亦更加严密。其城内“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合有二百二十里。”[10]（卷5）每里“方三百步”，成正方形，可见其规划布局已更向棋盘式方正格局发展了。另外，此时的坊里开始混称，《魏书》记洛阳的居民区划即称坊。[11]（卷8）而且坊里管理也有了明确记载：“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目的是“虽有暂劳，奸盗永止。”[10]（卷5）当然，最根本的目的恐怕还在于方便统治者控制和管理坊内的居民。

从以上论述看，春秋战国以降，坊市管理已初具规模，尤其是市制已极具精义，市民的交易及日常活动被限于固定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这显然是中国封建社会“官本位”体制下行政权力支配一切的社会现实，更是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条件下，政府抑商得力、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反映。

二

唐代前期沿袭了前代的种种管理经验并有所发展，从而使此时的坊市制度更加细致严密，达到了中古社会城市管理的顶峰。从现有资料看，唐代的坊市制度在各个方面都有所发展，主要表现在：

第一，坊市布局更加齐整。唐代城市的居民区组织称“坊”，即“两京及州县之郭内分为坊，郊外为村”[12]（卷3），“在邑居者为坊，在田野者为村”。[13]（卷48）市位于城坊中的固定地点。当时各城的坊市数不一，但都集中位于外郭城中，且布局更加规则齐整。以都城为例，唐长安外郭城的邸第、寺观、编户被南北向的11条大街和东西向的14条大街纵横分隔为110坊（包括两市），从而使外郭城布局匀称，整肃有致。白居易形容这种布局是“百千家似围棋局，十二街如种菜畦。”[14]（卷448，白居易《登观音台望城》）其他城市的坊市情况是：成都有金马坊、书台坊、锦浦坊、花林坊等，苏州有60坊（但坊名不见详解）；常熟“凡十二坊”[15]（卷1）；即就是边远地区的沙州城也有永宁坊（S. 3877）、修文坊（S. 1285）、政教坊（S. 3837 V）、怀安坊（P. 2482）等。

第二，坊市管理更加严格。宋人朱熹记唐之坊市管理曰：“唐制……最有条理，城中有几坊，每坊各有墙围如子城，然一坊共一门，出入六街，凡城门街角有武侯铺、卫士分守，日暮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城振，坊市门皆启。”[16]（卷90）唐律引《宫卫令》曰：“五更三筹，顺天门击鼓，听人行。昼漏尽，顺天门击鼓四百槌讫，闭门。后更击六百槌，坊门皆闭，禁人行”[17]（卷26），不得非时启闭坊市门；坊市门关闭后禁人出入，称为夜禁，违反者称犯夜，“闭门鼓后，开门鼓前行者，皆为犯夜”[17]（卷26），犯夜者要处以严刑；交易必须在市内进行，且聚散以时，“凡市，以日中击鼓三百声而众以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声而众以散”[12]（卷20），罢市以后至开市以前不得有任何交易活动。这种严格的坊市管理，把居民的活动限制在日间，从而形成唐前期“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的情形。

第三，有关法规更加完善。首先，对坊市垣篱严格维护。《唐律疏议》有“越……坊市垣篱者，杖七十，侵坏者亦如之。从沟渎内出入者，与越罪同。越而未过减一等”[17]（卷8）的规定，此条不仅保证了坊市墙垣不受侵坏，而且还使居民出入必由坊市门；其次，对坊市门定时启闭的贯彻执行。有“其坊正、市令非时开闭坊市门者，亦同城主之法（即徒一年）”[17]（卷8）的规定。特殊情况需开门者另有专文：“若公使赍文牒者，听。其有婚嫁，亦听。注云：‘须得县牒。丧、病须相告赴，求访医药，赍本坊文牒者，亦听’。其应听行者，并得为开坊市门。”[17]（卷8）再次，对夜禁的维护。唐律对犯夜者定有严刑，“诸犯夜者，笞二十；有故者，不坐。”[17]（卷26）可见，配合坊市制度的实施，相关法规已很完善。

第四，配套措施更加齐全。坊市门必须定时启闭，启闭信号最初是令旗，后来是各街的晨暮传呼之人，到唐太宗时，在马周的建议下改用鼓，号“咚咚鼓”[13]（卷74），更加方便有效；配合市内交易的定时聚散，据前引史料，唐代的市聚以击鼓，散以击钲。夜禁的维持措施亦很周全，《唐律疏议》卷八引《监门式》曰：“京城每夕分街立铺，持更行夜。”其他措施不更一一列举。

总之，唐前期的坊市制度较之前代，严密化细致化非常显著。其严格的法规和周全的措施足以体现统治者严密控制、完全操纵城市社会生活的用意和努力，反映了商品经济不发达条件下行政意旨占主导的社会现实。此时的坊市管理情形是：“中使郭里旻酒醉犯夜，杖杀之”[13]（卷15），“〔郑子〕既行，及里门，门扃未发……坐以候鼓。”[18]唐人诗作中更常见不少人清明节野游兴致很高，却很担心晚归夜犯严城鼓而惶惶不安的描述。

三

随着统一后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魏晋以降渐趋活跃的商品经济也迅速发展起来。中唐以后，甚至出现“如见钱流地上”[19]（卷149）的现象，足见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程度。商品货币关系以其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凶猛的力量冲击着社会的方方面面，城市作为商业的主要盘踞地，所受的影响和冲击更大，表现在管理这个侧面上，便是坊市制度的频遭冲击。早在唐中宗时，两京诸市已往往在正铺外更造偏铺以扩大营业面积，景龙元年十一月敕："两京诸市行，自有正铺者，不得于铺前更造偏铺。"[20]（卷86）武周时，李峤表文已承认："坊为要冲，地当贵里，亩赁二三十贯……夺其近市之门闾，生其破家之怨仇。"[21]（卷578）玄宗有诏称，京畿昭应县市内有"广造店铺，出赁与人"[22]（卷159）的现象，可见商贸的兴旺和坊市制度的渐难维持。

中唐以后，突破坊市制的现象不断出现，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坊市各有分区的局面被打破，交易活动不再只限于市内进行，而在坊区内出现了众多的商肆店铺。有关两京坊内的商肆店铺记载最多，长安城内延寿坊有造玉器和出售金银珠宝的[23]（卷下），颁政坊有馄饨曲，长兴坊有饼饽店[24]（续集·卷1），宣阳坊有綵缬铺[25]（《王团儿》），永昌坊有茶肆[13]（卷169），靖恭坊有造毡的毡曲，且大多数坊内有客舍[26]，道政坊和常乐坊有酿酒店[24]（前集·卷15）。洛阳的修善坊多酒肆、车坊[27]（卷1），清化坊与殖业坊有沽酒店[28]（卷1）。德宗时的宫市，即置于"两市及要闹坊曲"[29]（卷235），更点明唐中叶以后坊曲内有商贸活动的事实。国命所出的京城，坊内设店肆、商业活动出市入坊的盛况尚且如此，其他城市坊中设店的情形便可想而知了。另一种出市入坊的商业经营方式是车担叫卖。邹骆驼是唐代有名的豪富巨贾，"先贫，尝以小车推蒸饼卖之"。[28]（卷5）《续玄怪录》载长安里门侧有卖蒸糕的，"宣平坊有官人夜归，有卖油者张帽驮桶，不避道。"[24]（前集·卷15）《玉泉子》记洛阳街坊中有贩卖枯鱼的……坊市制受冲击的情形于此可见一斑。

其次，坊市围墙的严格性也频遭冲击。代宗时即有"诸坊市街曲，有侵街打墙、接檐造舍等，先处分一切不许，并令毁拆"[20]（卷86）的诏令，证明当时侵街打墙的现象已不少见。此后，唐政府又曾多次颁令严禁任何人破坏坊墙，还一度下令修补被破坏的坊墙，"贞元四年二月敕，京城内庄宅使界诸街坊墙，有破坏，宜令取两税钱和雇工匠修筑。""太和五年七月，右巡使奏……如非三绝者，请勒坊内开门，向街门户悉令闭塞"[20]（卷86），但收效甚微。至于侵街设店的现象更盛，"伏见诸街铺，近日多被……起造舍屋，侵占禁街。"[20]（卷86）可见，在经济发展的客观形势下，唐政府已成了典型的唠叨而没有威信的婆婆。

再次，夜禁也逐渐弛废。如果说唐代的夜禁情形一度是郑子坐以候鼓，郭里旻酒醉犯夜被杖杀的话，到后期，其情形已是京城宣平坊官人夜归遇卖油者，"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30]（卷1），可见人们对夜禁制度已渐趋不遵。到文宗时，京城坊门更出现"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犹未闭"[20]（卷86）的情形。至于城内夜市，就更热闹了，扬州"夜市千灯照碧云"[14]（卷11，王建《夜看扬州》），其夜生活的盛况更是"每重城向夕，倡楼之上，常有绛纱灯万数，辉罗耀烈空中，九里三十步街中，珠翠填咽，邈若仙境。"[31]（卷273）汴州的状况是"水门向晚茶商闹，桥市通宵酒客行"[14]（卷300），苏州"夜市卖菱藕"[14]（卷691，杜荀鹤《送人游吴》），广州"蛮声喧夜市"，唐末长安的崇仁坊"一街辐辏，遂倾两市，尽夜喧呼，灯火不绝。"[32]（卷8）这一切与唐初"鼓声绝后，禁断行人"的情形相比，何异霄壤！

总之，经过两千多年演化发展而逐步严密细致的坊市制度，随着唐后期商品货币关系的活跃发展而逐渐疲软松弛下来，城市空前地活跃繁荣，这是封建经济尤其是其中商品经济发展的结果，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标志着我国的封建城市在结构和面貌上已出现了向近代型城市迈进的征兆。后继的宋王朝继承了这一发展趋势，并于太祖年间宣布夜市合法，允许在街旁设店经商，坊市制度遂彻底崩溃。

四

综合上述，坊市制度在有唐一代的发展表现为前期制度上的细致化、严密化和后期实践中的滞后性和被突破，这种发展轨迹浓缩了唐代封建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矛盾。坊市制度的被冲击是中国封建社会在中唐以后开始出现局部变革的绝好反映，这种变革先从经济领域开始，当时封建经济繁荣，尤其是其内部的商品经济活跃发展，这虽尚不足以削弱封建经济的优势地位，但其繁盛足以对旧有经济及社会管理制度产生强烈冲击，坊市制度即其一。

总之，唐后期，经济领域内的商品经济显著发展，并开始要求王朝统治者之政策能顺应经济生活的发展变化，但唐朝统治者对当时的经济现实缺乏灵敏的体认和反映，所以从施政方面只能看到他们对变化了的形势的忧虑及排斥心理，故此一再地重申和严厉旧制，表现出对旧制的过分迷恋，这是政治上层建筑和社会经济现实之间相对游离、失衡状态的反映，上层建筑的变化总是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变化。坊市制度在唐末虽频遭冲击，但新的、顺应当时城市生活的管理体制终未形成，其最终取消还有待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统治者对经济现实的顺应。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

〔参考文献〕

〔1〕 金宝祥. 唐史论文集〔C〕. 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
〔2〕 戴德. 大戴礼记〔M〕. 王云五. 丛书集成〔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3〕 郑元注. 礼记〔M〕. 阮元. 重刊宋本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M〕. 上海：脉望仙馆，1887.
〔4〕 林尹. 周礼今注今译〔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
〔5〕 崔豹. 古今注〔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6〕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75.
〔7〕 三辅黄图〔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8〕 张衡. 西京赋〔A〕. 曹余章. 历代文学名篇辞曲〔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9〕 左思. 魏都赋〔A〕. 曹余章. 历代文学名篇辞曲〔C〕. 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
〔10〕 杨衒之. 洛阳伽蓝记〔M〕. 陶宗仪. 说郛一百卷〔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11〕 魏收. 魏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4.
〔12〕 张九龄. 唐六典〔M〕. 北京：中华书局，1992.
〔13〕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6.
〔14〕 全唐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15〕 黄廷鉴. 琴川三志补记十三卷〔M〕. 中国方志丛书〔M〕. 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9.
〔16〕 黎靖德. 朱子语类〔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17〕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北京：中华书局，1993.
〔18〕 沈既济. 任氏传〔M〕. 张友鹤. 唐宋传奇选〔C〕.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19〕 欧阳修. 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20〕 王溥. 唐会要〔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21〕 李昉. 文苑英华〔M〕. 北京：中华书局，1966.
〔22〕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北京：中华书局，1960.
〔23〕 高彦休. 唐阙史〔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4〕 段成式. 酉阳杂俎〔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25〕 孙棨. 北里志〔M〕. 陶宗仪. 说郛一百卷〔M〕. 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
〔26〕 徐松. 唐两京城坊考〔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27〕 韦述. 两京新记〔M〕. 溥良. 南菁札记〔M〕. 江阴：江阴使署刊本，1894.
〔28〕 张鷟. 朝野佥载〔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29〕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30〕 王谠. 唐语林〔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1〕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1.
〔32〕 宋敏求. 长安志〔M〕. 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M〕. 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

Changes is the Ru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Tang Dynasty

SHENG Hui-lian

(The Institute of Donghuangology, Northwest Normal 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 The rule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was the basic stipulation for governing cities and towns in the Chinese feudal society. In the Tang Dynasty, its devlopment displayed the quality of meticulousness and strictness in the regulation in the earlier stage, but in the later stage it was in a state of stagnation, so sluggish and slow in making any alterations that it was frequently criticized, attacked and broken through. This tendency of evoluti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relative disassociation or a state of unpairedness between the superstructure and the economic basis, that is, variations of the superstruction always lag behind those of the economic basis.

【Key words】 Tang Dynasty　　rules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management　　commodity economy

（责任编辑　胡小鹏／校对　古跃）

?1994-2014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